



轻与重

23

存在的遗骸

形上学之后的诠释学存在论

[意大利] 圣地亚哥·扎巴拉 著 吴闻仪 吴晓番 刘梁剑 译

姜丹丹 何乏笔 主编



Santiago Zabala

The Remains of Being

Hermeneutic Ontology after Metaphysics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轻与重
FESTINALENTE

姜丹丹 何乏笔 (Fabian Heubel) 主编

存在的遗骸

形上学之后的诠释学存在论

[意大利] 圣地亚哥·扎巴拉 著 吴闻仪 吴晓番 刘梁剑 译

Santiago Zabala

The Remains of Being
Hermeneutic Ontology after Metaphysic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存在的遗骸/(意大利)扎巴拉著;吴闻仪,吴晓番,刘梁剑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

ISBN 978-7-5675-2847-5

I. ①存… II. ①扎…②吴…③吴…④刘… III. ①西方哲学—研究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5587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THE REMAINS OF BEING: Hermeneutic Ontology after Metaphysics

by Zygmunt Bauman

Copyright © 2009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版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2-625 号

轻与重文丛 存在的遗骸

主 编 姜丹丹 何乏笔
著 者 (意大利)圣地亚哥·扎巴拉
译 者 吴闻仪 吴晓番 刘梁剑
责任编辑 高建红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2847-5/B·901
定 价 42.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主 编 的 话

1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

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2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3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对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悖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

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4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 *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 的词源有“平衡”（*exagium*）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examen*）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含“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 20 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

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何乏笔 (Fabian Heubel)

2012年7月

献 给

卡梅洛·杜托洛(Carmelo Dotolo)

安娜·梅苏蒂(Ana Messuti)

吉安尼·瓦提莫(Gianni Vattimo)

致 谢

谨向吉安尼·瓦提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他自始至终鼓励我从事本项研究。没有他的智慧、热诚与教诲,我就不可能在这项研究中找到我的路。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师、同事和朋友们:阿克斯(Floriano von Arx),卡多苏(Pablo Cardoso),克鲁兹(Manuel Cruz),杜托洛,费尔曼(Robert Fellman),菲西凯拉(Rino Fisichella),格朗丁(Jean Grondin),哈斯科尔(Michael Haskell),拉雷(Philip Larrey),里维(Antonio Livi),洛克纳(Wendy Lochner),梅苏蒂,帕尔默(Richard Palmer),皮奥拉(Mauro Piola),罗宾斯(Jeffrey W. Robbins),罗蒂(Richard Rorty),希恩(Thomas Sheehan),乌加齐奥(Ugo Ugazio)。

中文版序

哲学的未来在中国。此诚非浮夸溢美之词。在美国,分析哲学居于主导地位,存在不仅被遗忘,而且事实上已经被边缘化。作为研究哲学的欧洲学者,我对此深感焦虑。中国学者将本项存在论研究译成中文,这不仅反映出中国对大陆哲学的敏感性,而且更是实际发生的事件。我们必须把这一翻译活动解释为事件,即存在的事件。对于存在的事件来说,真理不是被描述,而是被解释。描述与解释之间的差异正是我所看到的美国与中国在当今哲学文化上的差别之一。美国已沉湎于描述存在者,因而也就执迷于分析哲学;中国则对解释存在之遗骸感兴趣。虽然很乐意继续讨论本项翻译工作的文化前提,但我最好还是就此打住,多谈点《存在的遗骸》一书的前因后果。

本书作于 2003—2008 年,旨在以激进的形式推进“柔弱之思”(weak thought)的存在论。这一哲学立场由瓦提莫(Gianni Vattimo)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后来得到了罗蒂(Richard Rorty)、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及其他众多后现代思想家的肯定。然则,何为柔弱之思?它在政治上有怎样的进展?

柔弱允许哲学对形上学(经由诠释学)的瓦解做出回应,允许哲学在人之“被抛状态”的可能性之中追寻新的目标与抱负:哲学不是要去理解永恒者,而是必须重新引导人类走向对自身历史的解释。有必要强调,“柔弱”一词的消极涵义并非暗指思想的挫败;相反,它提示了思想在形上学终结之后的转变,即一种解放的可能性。柔弱之思是一种极强的柔弱理论,其中哲学家的成就不是来自于催迫客观世界,而是来自于弱化客观世界的结构。弱化形上学的结构并不能让柔弱之思马上变得强大,因为总是有更多的结构有待弱化,正如总是有病人有待精神分析,总是有信仰有待世俗化,总是有政府有待民主化。一言以蔽之,“柔弱之思”的柔弱不应当解释为“刚强之思”的对立面,也不应当解释为以下发现的结果:不存在关于真理的客观描述;相反,“柔弱之思”的柔弱应当解释为我们的后现代状况。大概正因为这一点,查尔斯·泰勒指出,“一旦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挣破狭隘的道德主义的硬壳。

狭隘的道德主义外强中干,在强大与严峻的外表之下是一种根本性的柔弱。思想直接要求我们承认我们思想的完全柔弱(*debolezza*)。”^①

《存在的遗骸》必须放在上述脉络之中加以理解,也就是说,理解为我们思想之柔弱的前提。“遗骸”一词所指的存在之“磨耗”状态不仅让我们理解柔弱之思的存在论基础,而且使我们认识到柔弱之思在存在者层面与政治层面的影响。尽管本项研究属于严格的哲学考察,但政治向度的种子亦已埋藏其中,因为我所揭示的存在“遗骸”的柔弱性和“弱者”本身,即贫穷者,被忽略者或遭遗忘者之间并无太大差别。

我们可以看到,本书引发的后续成果包括以下观念:“柔弱之思”不仅是诠释学(关于解释的哲学)之思,而且还是“弱者之思”——所谓弱者,乃是指那些致力于为现实提供不同解释的人。瓦提莫首倡“柔弱之思,弱者之思”的框架之后,^②我和他一起决定,通过融合诠释学(海德格尔)和共产主义(马克思)发展这一框架的政治意含:如果说解释活动和弱者都在为

① C. Taylor,《现代道德理性主义》(*Modern Moral Rationalism*),见 *Weakening Philosophy*,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第75页。

② G. Vattimo,《柔弱之思,弱者之思》(*Weak Thought, Thought of the Weak*),见 G. Vattimo, *Off Reality*, trans. R. Valgent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in 2014。

变化而奋斗,那么,目标不在于创造一个新世界,而在于改变现存的世界。因此之故,在《存在的遗骸》(它可以视为“柔弱之思的存在论”)完成之后,我和瓦提莫决定写作“柔弱之思”的政治学,结果便有了《诠释学的共产主义:从海德格尔到马克思》一书。^① 这本书的主旨,我们可以通过改写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名言表述如下:“迄今为止,哲学家只是描述世界,现在到了解释世界的时候了。”

关于本书的前因后果还可以说很多,但限于篇幅,我必须就此打住了。而且,我还希望就中国的哲学敏感性再多说一点:它的独特贡献。贡献并不意味着为了守成或存活而维持某物;贡献首先在于改善自身的特质。大陆哲学将从这种贡献中受益,它让我们有机会从中国哲学家的原创性解释中学到很多。本书的翻译即是征兆之一。如果说,大陆哲学的未来在中国,那是因为翻译工作让欧洲思想家有机会和当代中国哲学家及其伟大的儒家传统交换关于存在的看法。

圣地亚哥·扎巴拉

2012年12月

^① G. Vattimo and S. Zabala,《诠释学的共产主义:从海德格尔到马克思》(*Hermeneutic Communism: From Heidegger to Marx*),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前 言

本书的论题如下：自柏拉图以降，哲学不仅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那样是对“存在的遗忘”，而且还表达了存在的残存，也就是说，存在的遗骸。巴门尼德、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之所以分别提出“*to on*”（存在）、“*es gibt Sein*”（有存在）和“*il y a de l'être*”（有存在），那是因为存在是事件，它具有原初意义上的慷慨和丰富性，从中馈赠并开启了哲学之思。在开始研究哲学之初，我阅读了柏拉图、奥古斯丁、尼采、杜威、帕莱松（Luigi Pareyson）以及其他一些哲学家的著作，形上学在那时便令我着迷、震撼，因为它所研究的是科学以之为前提却并未予以关注和回答的问题。事物具有一种普遍且完全决定性的属性，那就是存在。令人惊讶不已的是，正是这一存在引导哲学追问以下问题：存在者的存在是什么？是什么

构成了存在而非存在者、思考而非计算？计算属于科学之域，而科学研究存在者，比如核物理学，它关注原子核的力、相互作用以及内部结构。相反，思考则隶属于形上学的领域，因此是哲学的事业。哲学不关心原子核这样的存在者，而是思考原子核的存在，以便经验存在如何在每个原子核中彰显其自身。在如上的思考中，哲学并不像笛卡尔的主体性、康德的超验或尼采的唯意志论所做的那样贬低实体世界的价值；相反，它使自己沉浸于事物充分的“有”之中。

任何科学研究都有其或显或隐的存在论基础。自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及巴门尼德开始，存在论的问题，“关于存在的问题”，就已经决定了哲学与人类的本质。这一问题同时还关乎人类生活的目的及其意义，关乎价值和原则。正是我们实际的道德生活使得人类追问这一问题。尽管存在问题已被遗忘许久，但有幸在 20 世纪的开端，海德格尔将它重新带回到我们面前。沃尔夫 (Christian Wolf) 在 1729 年出版的《存在论》(Ontology) 一书中首先将存在问题称为“存在论”。自此以后，“存在论”便成为“形上学”的同义词。我们看到，存在问题曾经是，并且将一直是最真实、最核心的哲学问题。它最令我着迷的，并不在于绝大多数哲学家研究过它，而在于存在问题是所有其他问题的前提，因为它始终持存。换言之，即使是所有那些并未明确研究存在问题的哲学家与哲学流派也同样预

设了对存在的理解及存在的残存,而这种预设亦决定并限制了他们的研究工作。哲学史上,每个时代都相应于该时代某位重要哲学家为实体存在的命名:柏拉图的“相”(idea),亚里士多德的“现实”(energeia),阿奎那的“行动”(act),笛卡尔的“表征”(representedness),康德的“客观性”(objectivity),黑格尔的“绝对精神”(absolute spirit),柏格森的“生命冲动”(élan vital),尼采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伽达默尔的“交谈”(conversation),德里达的“迹痕”(trace),等等。既然存在问题暗含着必不可少的连续性,而作为哲学家,我们身处于研究存在问题的语言学传统中,那么,追寻存在问题便是我们的职责之所在。

所有这一切使我认真对待海德格尔的哲学,特别是“消解在场存在”或“克服形上学”所导致的后果。海德格尔提出此观点,一方面旨在从对存在的遗忘状态中恢复存在本身,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存在并未应用于人之在这一特定的存在形态。为了平息或激发我对痴迷存在问题的忧虑,我的导师曾经说过,“做哲学家就是要痴迷于作为动词的存在(关注何者存在何者不存在),因为它使你不满足于自身的同一性,它邀请你去寻找完整的存在视域——换言之,去对话”。他一再使我确信并非只有我一人对研究存在问题的哲学家感到痴迷,但他同时又告诉我,鲜有人从残存的角度分析首先由海德格尔所做的解构工作的后果。我决定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并不是